近代苏南宗族与上海

——以武进西营刘氏为个案

叶舟

【摘要】近代上海成为苏南宗族成员的主要移居地,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必带来极大的冲击,但同时,在陌生的都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这就使得当时在上海的苏南宗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以武进西营刘氏为个案,对苏南宗族迁居上海的模式进行初步的分析。

【关键词】苏南;宗族转型;近代上海;西营刘氏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3)06—0024—08

【作者简介】叶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235

在传统社会中,同一族人大量移居异地,即便是在京城也是罕见的现象,如西营刘氏便曾言:“凡我族人,宦辙所至,经商所历,足迹遍各行省,然以生活环境之不齐,欲集多数族人于一地,除春秋祭扫外,实不可能。”^①但是近代上海却成为原来聚居在乡村和非中心城市的宗族成员的主要移居地。这些大量人口的移入外地,加之上海的西式生活和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和宗法观念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但同时,在陌生的都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这就使得当时在上海的苏南宗族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武进西营刘氏是苏南常州的名门望族,并有家谱、旅沪通讯录等大量珍贵资料存世,本文便尝试以武进西营刘氏为个案,对苏南宗族迁居上海的模式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 基本概况

西营刘氏自称远祖出自西汉彭城,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第十九世刘真和侄子刘洪随汤和统兵下江南。次年攻克常州后,刘真统兵驻防常州西营,后世子孙世代居住在常州西营,遂称“西营刘氏”,刘真亦为刘氏宗族迁常始祖。第二世刘敬有一子刘俊,刘俊生四子刘敏、刘能、刘永童和刘永纪,刘氏宗族后世以这四子为四房逐渐繁衍,尤以长房刘敏、三房刘永童后代子孙最为众多。长房刘敏第四子刘璠的儿子刘崑,本为刘氏宗族的外甥,姓张,从小在刘家长大,后留在刘家改姓刘。值得注意的是,和当时一般普通家族不同,名门望族反而很少会攀附名人为祖先,刘崑的后代便从来没有避讳自己的祖先姓张。文廷式也曾言“国朝世家大族颇有非本姓者……其见于文集、笔记、族谱、行卷者,如海宁之陈元龙、世倌等本高姓,武进之刘纶本张姓,嘉兴之钱仪吉等本何姓,钱塘之

^① 刘春圃《卷首识语》,《武进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上海档案馆藏,卷宗号 Y4—1—291。

许乃普等本沈姓,合肥之李鸿章等本许姓,名人则李申耆本姓王,蒋心畬本姓洪,如此者甚众。”^①

刘崑之后繁衍至第十世刘履旋,成为宗族发展的一个分界点。刘履旋生有六子:刘维祺、刘维烈、刘云瑞、刘维宁、刘维章、刘维熊,六人的后世子孙均人脉兴盛,人才辈出,举业为宗族之最。其中著名的美术大师刘海粟便是刘履旋的二子刘维烈的后代,清大学士、博学鸿词科第一名刘伦及其孙常州今文经学集大成者刘逢禄为刘维宁后代。此外,三房刘永童的后代也不乏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子孙。如清大学士刘於义、会元刘嗣綰等均为三房后代。此房后人刘度来联合宗族各房子孙扩建了宗族祠堂,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宗族义庄,用以尊祖敬宗收族。^②盛宣怀的留园义庄和拙园义庄便是遵照刘氏义庄的相关规章建立起来的。^③

西营刘氏早期定居模式可以做如下简单概括,即外地人员异地为官,在城中定居,并建立全新的宗族组织,形成一种完全的城居宗族模式,而与之之前的宗族关系基本切断。实际上,这一模式与一般的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模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只不过是A地的乡村迁居至B地的城市而已,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乡土的羁绊。但即使这样,近代以前这种迁居模式也并不常见。到了近代,西营刘氏迁居模式发生了新的改变,开始大量地从常州迁居至上海,这一迁居行为在抗战期间达到了顶峰。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在坚持抵抗了三个月左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不久,11月29日,日军占领常州,江南遇到了自太平天国庚申之变后的又一次劫难。此时周边唯一的净土便是上海的租界,这便是所谓的“孤岛”,大量的江南难民再次云集上海租界。编于1938年的《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现藏于上海档案馆。其《尾语》中便称“吾族刘氏旅居沪地,其数至夥。比国军西撤,故乡遭劫,四方而至春申者更不可胜数。”^④《通讯录》收录了男口123人,女口107人,总计230人,此外还列出了时居于香港、重庆、成都、青岛及广西、广东、湖北的本族人员共15人。比照编于十年前的《西营刘氏家谱》,当时全族男口447人,则赴沪男口当占全族男口的近1/3,可见当时西营刘氏迁沪的规模。近代西营刘氏迁居上海的模式与传统的宗族聚居模式不同,是一种纯粹从城市到城市的宗族迁移模式,完全没有乡土的因素存在,在中国传统的宗族聚居模式中,这是一种全新的个案。同时,由于西营刘氏名门望族的属性,因此其迁居上海的模式,便成为了中国传统名门望族在近代变迁的典型样本。以《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为基础,对照族谱及其他资料,为我们全面分析刘氏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 《旅沪通讯录》的量化分析

1、职业

《通讯录》中涉及成年男性共69人,除4人职业不明以外,另外65人均有详细的职业介绍。其中政界15人,金融界12人,商界11人,教育界8人,军界5人,工程师4人,会计2人,医生3人,电影业2人,编辑1人,药剂师1人,律师1人。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西营刘氏在上海的所有成年男性成员中没有一名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普通工人和小职员。西营刘氏历史上可谓名人辈出,整个清代这个家族产生进士21人、举人27人,为官者更是层出不穷。旅居上海的西营刘氏成员其中不乏清代名人之后,如刘逢禄的玄孙刘廷煦、刘嗣富的玄孙刘春圃、刘夔龙、刘度来之子刘峰等。虽然时代变迁,原有的科举功名官职已不复存在,所有成年男性中也只有年纪最大的刘琛(时年68岁)在前清时代任过知县,但刘氏成员依然均从事上层的良好职业。可见在新的时代,传统社会的名门望族依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足以顺利地实现转型和过渡。当然,刘氏宗族本身的特点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刘氏宗族和

① 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16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西营刘氏家谱》卷3,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③ 刘炳照《盛行轶修谱处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

④ 《武进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

很多以乡土为根基的宗族不同,他们原本生活在城市,不仅不是农民,绝大多数族人甚至都不是城市平民,基本上都属于城市中上层阶级,有一定的财富和文化素质。因此,其族人迁居上海之后,较之其他一般宗族成员而言,更容易获得良好的职业。

其次,刘氏成员以从政者为最多,加上军界的5人,占了总数近三分之一,可见从政依然是传统望族的优先选择。在中国社会中,从政为官永远是获得各种资源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望族为维系其地位,将做官作为第一选择是相当理性的策略。又由于望族有做官的传统,相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更加谙熟官场的规则,因此也更容易获得晋升。还值得注意的是在15名从政的成员中,除了刘琛是退休知县外,其余均为警官、盐务官员和财税官员,这也是在当时的中国政界掌握资源最为丰富、获得利益最多的行业。刘氏成员均从事这三个行业,即使没有明确的职业策略规划,也是长期混迹于官场之后的理性选择。

第三,从事金融、商业的人员已经超过政界与军界人数之和。在传统中国,社会既承认商人在交往有无、物质流通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又对他们保持了一种戒备,既妒羨其可以一本万利,过上富裕的生活,又轻视贬低,认为他们身上只具有铜臭气,所以商人有一块法定的生息空间,又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常州以读书闻名,其风俗本不重商,有“末流乃负贩”的说法。像西营刘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始终把科举放在第一位,从商则放在次一等的位置。但常州又地处商业发达的江南,交通方便,市场繁荣,难免不受到商业的影响,更不可否认人有追逐利益的天性。早在清乾嘉时期,洪亮吉便称“昔之为农者或进而为士矣,为贾者或反而为农矣;今则由士而商者十七,由农而贾者十七”。^①所以,虽然表面上没有强调经商挣钱,但实际上西营刘氏从事商业的成员应该早就有,而且也不在少数。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从商成为了又一个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所以刘氏家族中便大量出现了从事金融、商业的成员。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中,政商不分的情况古已有之。从政获得资源之后来从商,一直是很多名门望族的经营策略,苏南很多望族如常州盛氏,无锡薛氏、唐氏等一直是亦官亦商,近代以后这一情况更加突出。如《通讯录》中的刘桐既是江苏民政府实业司第一科科长,也是安徽中国银行行长。又如刘春圃既是江苏淞沪警察厅司法科长,又从商;其堂弟刘夔龙是北京税务局参议,又有陆军少校的军衔,在上海还是华丰面粉厂的股东。这种政商不分,政商一家同样也是刘氏家族维持其长远发展的一项理性策略。

第四,在通讯录中有4位工程师、3名医生、2位会计师、2位电影从业人员、1位药剂师、1位律师、1位在《大英晚报》中担任编辑。这些代表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新兴职业的从业者出现,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代表着现代都市文化对传统名门望族职业观念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名门望族中并非罕见。如吴建华曾对常州庄氏第16世至第18世进行过统计,发现其中也有大量从事电报业、铁路业、海员、律师、翻译等新兴职业的成员。^②如果说医生是名门望族从业的传统选择,编辑、药剂师、会计师、律师等和传统职业观念还没有冲突的话,那么2名电影从业人员的出现,则代表了传统职业观念的彻底转变。在传统社会中,从事演艺事业的所谓优伶,向来为诸望族所排斥。如盛宣怀家族便在族谱中规定“为僧道,为胥隶,为优戏,为椎理屠宰,犯者宜会族众委曲开谕,令彼省悟改图,断不可避嫌姑息也。”“有失身娼优奴隶,原谱削其名,并妻子不书,均不入,示绝也。其三代以后子孙能改过自新,方入。”^③而在此《通讯录》中电影从业人员已经成为了高尚职业,不仅正大光明地记录在案,而且其从业者均为名门之后。刘尔权的父亲是湖南阮州知州,外祖父是湖南知县。刘继群是清会元刘嗣绶的玄孙,父亲刘明禔是候补知府,外祖父史悠庆来自常州另一望族,官居湖南知府。

第五,从《通讯录》中我们会发现一件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在从事教育业的8人中,有4人在

① 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补遗·服食论》,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40页。

② 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③ 《龙溪盛氏族谱》卷首《宗规》,民国三十二年敦睦堂木活字本。

上海美专任教授,除了时任上海美专校长,列名《通讯录》中的西营刘氏成员著名美术大师刘海粟外,还有刘海粟的哥哥刘荣昌、堂弟刘懋、侄子刘狮。除了此4人外,还有2人为美专毕业生,2人现在美专读书,而2位美专毕业生则都是刘荣昌的儿子。刘氏在上海的69名成年男性中,和美专发生关系的占了近10%,这应该不能用偶然来解释。很显然,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专的校长,他对他的族人,尤其是血缘最亲近的弟侄有着特殊的照顾。诚然,我们不能否认,有画鱼圣手之称的刘狮确实是出色的画家,刘荣昌在美专教中国文学也有口皆碑。但刘荣昌的两个美专毕业生的儿子此后都从政,可见进美专读书只不过是他们向前发展的跳板,他们能进美专看来也不是有美术上的天赋,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刘荣昌的儿子,刘海粟的侄子而已。由此可知,即使在上海美专这样的现代都市新型机构当中,教师招聘和学生招收上,血缘关系仍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海粟既是现代意识极强的艺术家,也是西营刘氏在上海滩上最有名的人物,这双重身份,导致了艺术上的离经叛道、大胆创新和在办学、用人上对血缘关系的重视,这看似矛盾的表现并存于刘海粟的身上。在一个异乡城市,血缘关系是获得工作和求学的捷径,即使今天也不例外。这种情况也并不只是在刘海粟的上海美专中存在。如刘尚德是武进银行的经理,其子刘乾亦在武进银行工作;刘桐曾任蚌埠银行的经理,其子刘勋率则是同家银行的主任。就业求学中的血缘优势还扩大到同乡优势中,此处仅举一例。刘宪是常州职业学校校长,他到上海之后,立即被同乡许冠群聘请到了旗下的新亚药厂担任人事部经理,这显然是同乡因素起的作用。这一切恰恰反映了血缘等看似传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仍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并依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教育

苏南人历来重视教育,教育在苏南宗族长期发展策略中更占据了重要位置,名门望族对教育的重视当然其目的在于培养尽可能多的进士举人。但据吴建华的统计,江南大部分家族仅有10%不到的人有机会获得青衿,因此,家族的教育策略其实是保证尽可能多的族人有机会获得教育,先保证基本教育的普及,其次才是提高精英教育的成功概率。西营刘氏便是一直重视教育,其建立祠田的目的也是为了“俾有余资,延请名师,训导无力宗人子弟俱得读书上进”。^①这也是西营刘氏为何从清代到近代一直人才辈出的原因之一。据《西营刘氏清芬录》的统计,刘氏族人有著作流传的便有63人之多。到了近代,新兴学校大量出现,留学国外也成为一种新的选择,作为功名仕宦不绝的望族子弟,其实很容易从一种教育潮流投向另一种教育潮流。

首先,重视基础教育。《通讯录》中所有的刘氏男性族人都曾经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教育,所有10至20岁的适龄青少年无论男女,无一例外都在读书。

其次,高等教育普及率很高。在20—25岁的适龄男青年共10名,除2名以外,均在大学读书,包括上海美专2名以及圣约翰大学、同济大学、陆军大学、雷士德大学等。另外还有16名男性成员大学毕业,所毕业学校包括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学院、中法大学、金陵大学等。此外还有4名曾经留学海外,包括3名留日及1名留法(即刘海粟),大学毕业程度及以上者在所有的成年男性中占29%。如考虑到成年男性成员中包括曾经经历传统科举考试者,而且大学在国内创办不到50年时间,当时学校数量尚不很多等因素,这一比例是相当高的。由于新式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西营刘氏的成员还有6名在早期还参加一些法政学堂、武备学堂、师范讲习所、财政讲习所等的学习,如果加上这些成员的话,大学学历获得者的比重还将更高。

第三,西营刘氏成员对教育的重视还体现在成员中从事教育的很多,而且很多人是学校的创办人或者是校长。如前所述,西营刘氏有10人从事教育,其中有3名是校长,包括上海美专创办人兼校长刘海粟、江苏省立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刘勋麟、私立大江中学创办人兼董事长刘士林。另外还有4人曾经从事过教育工作,如刘桐曾经是江南高中两等商业学校教务长,刘宪曾经是上海市立职业学校校长,此外还有当时暂时不在上海,没有列入《通讯录》名单,但是家眷都在上海的常州粹

^① 《西营刘氏家谱》卷7《祠田记》。

化女中校长、常州教育局局长刘同文。

3、婚姻圈与女性观

整个通讯录中共涉及到 66 个婚姻关系,对照前章所分析的传统社会名门望族的婚姻关系,可以发现既有延续又有变化。

门当户对是名门望族最重要的婚姻策略,同时由此产生的副产品便是望族间的世代联姻。这在《通讯录》中仍然有所表现。比如,常州最有名的世代联姻便是庄刘两家的联姻,而在《通讯录》中显示,庄刘两家的联姻在经过数百年之后仍然持续,江苏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刘勋麟便娶了庄宝澍的女儿。刘氏与常州其他望族之间的联姻还有刘琛娶了著名画家汤世澍的女儿,刘廷恂的母亲是举人程惟孝之女,刘继群的母亲是湖南知府史悠庆之女等。门当户对的婚姻模式包括两种,即强强联合和新旧交融,陆军部咨议刘元长娶的是赵凤韶的女儿,而赵凤韶是晚清幕僚赵凤昌的弟弟。赵凤昌所在的青山门赵氏并非传统的名门望族,而晚清崛起的新兴家族,西营刘氏与赵氏的联姻很明显是以赵氏声望逐步提高,资源不断积累为基础的。

66 个婚姻关系中包括 15 个异地婚姻,22% 的比例和传统社会的异地婚姻比例基本一致,这表明,即使在近代社会,婚姻圈始终是以本地为中心的。而且 15 个异地婚姻,其中有 13 个仍然局限于以常州为中心的周边地区,包括宜兴 1 个,元和 1 个,震泽 1 个,吴县 1 个,溧阳 1 个,江宁 4 个,无锡 4 个,另外 1 个湖南陈氏则是世居常州,其实可以视为常州本地宗族。而且异地婚姻也仍然是以门当户对为基本标准,如无锡的嵇、顾、孙均是名门望族,宜兴的周氏是内阁中书之女,江宁周氏是浙江按察使之女。然而 15 个异地婚姻中唯一一个例外却显示了传统婚姻关系的新变化,留学日本的刘狮娶了一位日本太太邦子,跨国婚姻第一次出现在名门望族的婚姻关系中。但是更大的变化是在通讯录中没有体现出来的一个个案,刘海粟的婚姻彻底改变了传统望族的婚姻策略,代表了近代都市文化对传统婚姻关系的有力冲击。

《通讯录》中刘海粟的妻子只标明江宁成氏,表面上好像只是传统名门望族异地婚姻圈的延续,实际情况则完全不同。刘海粟的父亲刘家凤,娶洪亮吉的孙女,著名骈文家洪麟孙的女儿。他的长子刘际昌,娶吕德全的女儿,吕德全则是吕思勉的叔叔。次子刘荣昌,先娶了庄企徵的女儿,庄氏卒后,继配溧阳唐氏。刘荣昌与庄氏的婚姻仍然是庄刘联姻的延续,而刘吕之间也属于世代联姻。刘家凤第三、四、五个儿子都没有活到壮年。刘家凤给第六个儿子刘海粟选择的婚姻对象是丹阳商人,前任道台林氏的女儿,一直到此时,仍然属于传统名门望族的婚姻模式。但是随即发生的事却将一切模式全部打破。刘海粟喜欢的对象是表妹杨守玉。这个类似于巴金小说《家》中描绘的故事,在传统社会中其实很常见。洪亮吉少年时心仪表妹蒋氏,但外祖母为他选择了另一段婚姻,洪亮吉性格叛逆,而且终生难忘表妹,但他只能接受家族为他安排的婚姻,并没有任何的反抗。^①但是刘海粟却选择了反抗,他在结婚后逃到了上海。^②

洪亮吉没有反抗,刘海粟反抗,这是因为时代的变化,新的婚姻观在当时已经开始传播,家族安排婚姻的模式已经不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刘海粟的婚姻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915 年,他在上海遇到神州女中的老师张韵士,一见钟情,随即与之结婚。刘海粟和张韵士生活了近 20 年,张韵士为刘海粟生了龙、虎、豹、蛟、蟒五个儿子。^③在《武进西营刘氏家谱》刘海粟一栏中,称其“配张氏韵士”。但之后,刘海粟爱上了他在上海美专的女生成家和,征得张韵士的同意之后,两人离婚,1933 年,刘海粟又与成家和结婚,所以在《通讯录》中刘海粟的妻子是“江宁成氏”,刘海粟当时比成家和大 10 多岁,成为上海滩上令人瞩目的新闻。^④十年之后,刘海粟和成家和又离婚,并在不久之

① 关于洪亮吉与表妹事,参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92 页。

② 《刘海粟年表》,《刘海粟画集》下,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14 页。

③ 《刘海粟年表》,第 416 页。

④ 《刘海粟年表》,第 419 页。

后和夏伊乔结婚。^①

刘海粟的婚姻故事在今天听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又一个名人的花边新闻。但在当时,无论是最初的逃避家族安排的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第二段自由恋爱结婚,第三段师生恋,以及第二段、第三段的夫妻双方协议离婚,这一切都是对传统望族婚姻模式的冲击。但必须注意的是,家族在面对这一冲击时,并没有不知所措,更没有采取开除出族之类的极端措施,而且是重新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一般而言,家谱记录婚姻模式有一定的规则。如庄氏族谱中便规定“世表内所书配偶,书‘配’字,继娶者书‘继配’二字,娶妾者书‘侧室’二字。……年久遗姓无考者,书‘某氏娶’,再醮者书‘室’字,继娶再醮者书‘次室’二字。有出醮者,削姓空白,以别薰莠。”^②西营刘氏也基本是按照这一规则记录的。但是以上最多只对寡妇再嫁这一问题作出了相应规定,并没有对现代离婚再婚的情况有相关的措施。在传统宗族观念中,婚姻被称为终身大事、天作之合,离婚被认为是违背天意的,不仅非常少见,而且还只是男子特权。男子择偶不适,可停妻再娶,而女子只能忍痛终身。自20世纪以来,因文化的进展和思想的变革,离婚不仅被允许,并且逐渐普遍。1930年12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从属于民法典的婚姻章,规定“夫妻两愿离婚者得自行离婚”,并在某些方面给予女子权益以倾向性的保护。^③法律公布之后,据吴至信当时在北平的调查,离婚案数字开始暴增。^④面对这一新的情况,传统家族也在进行调整。以刘海粟的婚姻情况为例,《家谱》中没有记录和丹阳林氏的这一段婚姻,《通讯录》中则略去了他和张韵士的婚姻。虽然这只是回避矛盾的不得已而为之,但也说明传统家族在面对新的婚姻关系时所做的一些努力。

传统家族不仅在调整对婚姻关系的认识,也在调整有关女性的观念。如前所述,这部《通讯录》中所有的学龄青少年,不管男女都在学校读书。和之前一般的认识不同,传统家族一向重视对女性的教育,因此,把女孩子送到新式学校读书和之前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太大矛盾。但是另一方面,传统家族让女性获得一定的教育,提高女性的素质,是为了有助于其将来相夫教子,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加强其在婚姻市场上的砝码。但是在新的时代,女性受教育已经不完全只是为了日后的婚姻做准备工作。“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形象不再是望族衡量女性的唯一标准。培养独立的新女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女性有了走出家门的要求,开始进入社会,在一些新兴的产业、职业中崭露头角。在这本《通讯录》中有20名20岁至30岁的女性,其中有8名女性已经标注了职业,包括1名医生,2名护士,1名药剂师和4名教师,占了总数的40%,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比例了。这种新的女性教育观念和女性职业观念,其实也已经成为当时诸望族的一种共识。如庄觉生修订庄氏《家规》便称“世风日开,男子本志在四方,女子亦宜就学。”^⑤庄蕴宽对其外甥女陈衡哲便称“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地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⑥

三 现代族会的雏形:西营刘氏五福会

中国的宗族制度,大致经历了两种形态的变更,即从贵族的宗子制到民间的族长制,明清宗族基本上以祠堂、族谱及家庭共有财产为基础,实行小宗法,家国分离,族长管理的组织体系。而到近代,家族组织形态发生新的变化,族会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新形态。族会制度起源于上海,据《上海曹氏族谱》称,在光绪末年,随着预备立宪公会等近代社会团体的成立以及地方自治意识的增强,上海的朱氏、王氏便已经“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庭立宪”,分别成立自家的族会,曹氏也于宣统

① 《刘海粟年表》,第420页。

② 《毗陵增修庄氏族谱》卷首《续增义例》,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③ 孟昭华等《中国婚姻与婚姻管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④ 吴至信《最近十六年之北平离婚案》,《社会研究季刊》1935年第1期。

⑤ 《毗陵增修庄氏族谱》卷11《续订家规四则》。

⑥ 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纪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陈衡哲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2页。

元年(1909)成立族会。^①族会与以前宗族的组织形态最大不同是以近代社会团体为标准建立起来的组织。所谓现代社会团体,是由成员自愿组织,为实现成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有组织、有宗旨、有纲领、根据选举产生,实行民主管理,这些社会团体的基本特点,族会已经基本具备。社会团体是现代公民社会发展的产物,而族会的出现,特别是在上海的出现,很显然和现代公民社会思潮引入中国是息息相关的。西营刘氏也同样建立了一个典型的现代族会,即五福会。五福堂是西营刘氏大分十七世刘绍灏(字容深)的堂名,刘绍灏(1830—1886)子孙满堂,共有十子,其后人便以堂名为会名,组成五福会。其章程开宗明义就称“本会以联亲谊,谋公益,子孙永久团结,以期上承先德,垂裕后昆为宗旨。”“公益”、“团结”、“宗旨”这些名词的使用,都反映了其特有的时代特色。

章程规定,凡刘绍灏子孙,年满20岁,无论男女,包括妻子均是本会会员,女子出嫁后虽然不再是会员,但对五福会仍然有建议和请愿权。从这一点,五福会的会员和传统宗族成员有根本性的差异。一是传统宗族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宗族活动,家长是家庭参与宗族活动的代表,而五福会成员则是个人身份的会员,与家庭无关。二是传统宗族中,女儿和妻子一般没有独立参加宗族活动的权利,而族会接受女性会员,出嫁女儿虽然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也有请愿和建议的权利。

章程又规定,会员必须根据规定承担一定的义务,享受一定的权利。包括依选举规则所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议事规则所定有提议和请愿权,依纳捐规约所定有纳捐义务,依会章所定有服务公权之义务等等。会员通过民主选举,推选出主持会务的总管和负责财务的会计,总管和会计任期三年,连任不得超过两届。总管可任命庶务和书记各一人,会员大会每年4月1日和11月1日举行,如果五人以上会员提议,或总管提议,有三人以上会员同意,则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大会所产生的各种议决案均由会员投票选举产生。这种会员、会员大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是与现代社会团体如出一辙,与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度,尤其是族长制则完全不同。当然,章程要求总管是从族中辈尊年长者选举出,这多少仍保留了传统宗族尊长的理念,但是章程又要求会计由会员中明会计法而有信用者担任,并要求每年制定预算和决算表,这又符合现代社会职业分工和专业化的理念。可见,章程尽量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五福会通过会员捐款进行运作,对收支财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如非经大会议决,不得动用特别用款,零星用款数在十元以内者经总管同意,由庶务经手。收款时,会计要开具一式三联的收条,一条为会计对会员的收据,一条为会计报告总管的凭单,一条为会计留存的存根。庶务用款也必须签具一式三联的款项领用单,第一联由总管签字,第二联向会计领取款项,第三联作为存根。动用特别用款时,会计到银行提现,也必须经总管签字盖章后进行。会计处的账簿也规定要分日记簿(流水账)、分款簿、统计簿、预算簿和特别用款簿五种,要求十日一结,一月一结,一年一结。而所有族会财产的单据契约也均归总管保存,不得用于抵押。同时要将所有契约联单编列号数,编印成账册,交由各会员存查。会员要检查单据及财务簿记,只要正常理由,两位会员以上,便可随时提出进行检查。五福会的财产来源虽然和传统的宗族通过捐献经营族产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由于现代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的引入,使得整个财产的管理更加公开、科学。

由于五福会的捐款是规定月工资收入的百分之一,因此五福会还有详细的会员报告和通讯制度,每半年一次通报住所、工作情况、收入、父母安否等情况,有新生子女、婚嫁、迁居或工作改变必须随时报告。而五福会不仅要按时报告族会收支情况,会员情况,在每年阴历春节和阳历新年还要用红单帖或者新式明信片进行联络拜贺。^②

五福会虽然在章程中称本会设在武进,但如果将五福会的成员与《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相对照,便可发现将近六成的五福会会员都生活在上海,只有不到20%的成员留在武进本地。刘绍灏有

① 《上海曹氏族谱》卷4《社会缘起》,中华书局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② 《五福会章程》,《西营刘氏五福会支谱》,民国铅印本。

十个儿子,当时六个儿子已经去世,其余诸子均在上海,刘持成(荅石)还是《西营刘氏旅沪通讯录》的发起人之一。其孙辈也大多在上海,即使不在上海,也在青岛、浙江、广州、香港等处工作。由此可见,五福会其实也类似于一个迁居外地的宗族分支,五福会这样的族会的创办很显然地受到了上海的影响。上海从晚清开始,自治意识和公民意识已经开始出现,形成了社会团体开展的风潮,这种潮流也推动了宗族组织形态的改良,已知的族会大多都设在上海便可证明。上海这些已经形成的族会,如前述曹氏、朱氏等对五福会的形成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对照一下彼此的章程,便可以发现五福会的章程也借鉴了其他族会的某些内容。当然,我们绝对不能将五福会等族会视为当时宗族改良的普遍情况。在整个社会均处于转型阵痛的近代,由于城市化水平依然有限,制度建设仍有明显欠缺,大多数的宗族调整的步伐都不可能太大,所以族会只可能是少数的特例而已,但重要的是,至少从族会的产生可以发现宗族具备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更何况,如果将族会与现代海外的新式宗族组织如宗亲会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们之间的类似性和传承关系,由此可见,只要环境许可,宗族向现代社会组织转型有着相当的可能。

四 结 语

西营刘氏宗族迁居上海的模式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典型性。首先,上海的西式生活和商业社会所带来的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对刘氏迁居至此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婚姻观念、女性观念、职业观念等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其次,由于名门望族在传统社会中掌握了一定的资源,并且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因此,他们在面对这些冲击的时候,有实现平稳过渡和转型的可能。而且其原先拥有的一些优势,如关系网络、社会资源等对他们在新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仍然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西营刘氏宗族定居模式比较特殊,作为一个完全城居的宗族,其受乡土的束缚较小,成员普遍素质较高,接受新事物较一般宗族更加容易,因此较易作出转型。从这一角度而言,西营刘氏可以说是中国宗族近代转型中的特例,但另一方面,西营刘氏又可以被视为宗族近代转型的典型样本。根据这一样本,也许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近代以来,部分宗族面对时代大潮,正在努力适应,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上海这样相对发达的大都市也提供了这种调整和改变的环境。这从晚清到近代,宗族一系列的改良和调整便可以看出。除了坚持父系原则之外,宗族等级、宗族法规都可以被更加文明的形式所取代,宗族教育可以被现代学校所取代,宗族本身也开始向着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演进。宗族的这种转型是与其成员构成及所在环境密切相关,宗族城市化程度越高,宗族成员素质越高、宗族所处的环境越开放,宗族实现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从另一角度看,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推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整体素质,那么宗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这种改良步伐虽然缓慢,但一旦开始便已无法停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近代苏南宗族的城市化与上海(批准号12CZS05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素 一)